

# 贤良文学与魁奈的重农抑商论<sup>\*</sup>

魏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贤良文学与魁奈是中西方重农抑商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经济思想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重农思想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关键词]**贤良文学; 魁奈; 重农; 抑商; 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91.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10)02-0129-05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最先决条件,也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sup>[1] 169</sup>重农思想贯穿古代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全局。中国的重农思想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盛行于西汉。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期间的“义利之辩”首开农商争论的先河,贤良文学所倡导的“崇本抑末”论奠定了后代封建帝国重农抑商思想的理论基础。法国“重农学派”出现于18世纪50至70年代,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sup>[2] 333</sup>综观贤良文学与魁奈的重农思想,存在许多相近之处又各具特色。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重农思想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贤良文学和魁奈都强调农本商末,主张从立国与治国的高度来重视发展农业。具体而言,两者思想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西汉中叶,为巩固封建地主统一政权,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全面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首先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山海之利,广泽

之蓄,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盐铁论·复古》);为开辟财源,又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如盐、铁、酒等实行专卖,“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史记·平准书》)统制经济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长期战争和繁重的赋税致使民穷财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此,“乞昭帝世,……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议起焉。”(《汉书·车千秋传》)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提出“进本退末,广利农业”(《盐铁论·本议》)的思想。他们认为“农,天下之大业也”(《盐铁论·水旱》),并明确指出“衣食者民之本也,稼穡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盐铁论·力耕》)在贤良文学看来,农业是富国之本,也是唯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盐铁论·忧边》)贤良文学认为民生困苦的根本原因在于本业荒、末业兴,“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盐铁论·本议》)“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盐铁论·力耕》)

\* [收稿日期] 2010-01-1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YD-02)“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构建——中西方‘义利思想’演进之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魏悦(1972-)女,辽宁沈阳人;副教授,博士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任教,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由此出发,贤良文学提倡封建政府“强本禁末”,鼓励和扶持农业生产。“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盐铁论·水旱》)“故非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盐铁论·轻重》)

与此类似,法国重农学派也缘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路易十四、十五两朝片面强调流通领域,造成农业萧条,农民贫困。再加上从1560—1715年之间发生的宗教战争、30年战争以及路易十四的扩张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国家财政濒于绝境。为挽救危机,重农主义应运而生。作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他说:“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sup>[2]333</sup>“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它一切的阶级。”可见,农业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农业进步标志着一国的强盛。“农民穷困则政府穷困,政府穷困则国君穷困。”“只有农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需的武装力量。”与重商主义者不同,魁奈反对将货币与财富等同起来,他指出“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并不是货币的多少,而是决定于每年再生产的财富是否丰富”。重商主义“把这些金属变成了偶像,人们忘记了把它们召到贸易中来的企图和目的是为了它们在交换和相互交付中充当抵押品。”<sup>[1]115</sup>因此,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产的来源”<sup>[2]48</sup>,“只有农业才使构成财富的物质和产品的数量倍增”<sup>[4]35</sup>。在魁奈看来,农业是工商业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农业荒废,其他产业必将受到损害。“亚麻、大麻、羊毛、蚕丝是我们工业生产的原料,小麦、葡萄酒、烧酒、皮革、咸肉、牛油、干酪、脂肪、油麻布、网具、呢绒、布匹等则构成我们输出贸易的主要产品。它们的价值是从我们自己土地上产生的是纯粹的利润,是不断再生产的财富。”<sup>[2]32</sup>“农业繁荣,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一旦土地荒芜下来,无论从事水上工作或陆地上工作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sup>[2]308</sup>所以,“一切对于农业不利的东西,对于国民和国家是有害的。一切有利于农业的事,也有利于国家和国民。”<sup>[2]219</sup>为保障农业的繁荣,还必须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管理。“土地的肥力、产品的售价和资金的合理使用都决

定于人的劳动和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富裕的四个根源,它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进行着竞争。但是只有在政府对人、对所有制和产品加以正确保护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起作用。”<sup>[2]103</sup>“只有政府决定保护租地农场主,才能使这样的人,巩固他们专门从事农业的决心。”<sup>[2]19</sup>由上可知,力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促使国家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是贤良文学与魁奈重农思想的主题和中心线索。

## 二、工商业不能创造财富

在主张“力耕”的同时,贤良文学竭力否认工商业能以致富,他们认为工商业所带来的“利”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它只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再分配,即所谓“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盐铁论·非鞅》),无助于财富总量的增加。“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玕,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盐铁论·通有》)“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盐铁论·本义》)在贤良文学看来,工商业的发展只会妨碍农业,不利于治国安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觑而心不作,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盐铁论·力耕》)“夫文繁则质衰,未盛则本亏。未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恚。民恚则财足用,民侈则饥寒生。”(《盐铁论·本义》)贤良文学以楚、赵之民“民淫好末”却“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之民“好本稼穡”而“无不家衍人给”为由,强调“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翮。”(《盐铁论·通有》)如果不“力耕”于农,“不修其源而事其流,……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盐铁论·忧边》)在此基础上,贤良文学将国民按职业划分为农、工、商各个等级。“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样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与流通,但“农”居主导地位,凌驾于“工”、“商”之上,显示出在汉代森严的阶级结构中,农业生产者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是贤良文学重农抑商思想的现实表现。

和贤良文学相似,魁奈从等价交换原则出发,论证了工商业不能增加物质财富。他指出在自由

竞争条件下, 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 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 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 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sup>[5] 186</sup> 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 不可能创造财富; 而工业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各种物资因素结合起来, 改变它们的存在形态, 并没有增加物资本身。因此, 工商业是不能使物质财富有任何增加的部门。“应当把从土地上生产财富的人们的劳动同在工厂里制造各种制造品的工人的劳动加以区别。前者能生产盈利, 后者生产的制造品, 其价值仅能与所花的支出相等。”<sup>[2] 189</sup> 只有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因为他的劳动是唯一生产出超过劳动报酬的东西的劳动。”<sup>[4] 29</sup> “从土地取得的盈利扣除了一切支出以后, 所余的产品就是构成国家收入的每年创造的财富。”<sup>[2] 176</sup> 在魁奈看来, 工商业只是农业的派生部门, 必须依靠农业才能存续和发展。“实际上, 如果没有土地生产物, 没有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和支付, 哪里还有商业的利润和手工业者的工资呢? 如果把商业和农业分离开来, 认为它能够独立存在则不过是一个抽象。”<sup>[2] 65</sup> 以此为基础, 魁奈对法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 他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三个阶级: 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者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 逐年再生产国民财富的阶级, ……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 “土地所有者阶级, ……依靠收入, 即纯产品来生活, 这些纯产品是生产阶级每年从再生产财富中, ……把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阶级的”, “不生产者阶级, ……他们的支出, 是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sup>[2] 308</sup>。在三个阶级中, 生产阶级占首要地位, 不生产者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附于生产阶级而存在, 这种次序明显的阶级划分充分说明工商业是非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部门。

### 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贤良文学继承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思想, 主张富民之道在于“无为而治”, 反对官营工商业。“顺天之理, 因地之利, 即不劳而功成。”(《盐铁论·忧边》)针对盐铁官营的诸多弊端, 贤良文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今郡国有盐铁, 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 成贪鄙之化。”(《盐铁论·本义》)“公卿处尊位, 执天下之要, 十有余年, 功德不施于天下, 而勤劳于百姓, 百姓贫陋困穷,

而私家累万金。”(《盐铁论·国疾》)从盐铁专卖的效果看, “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盐铁论·轻重》), 并未达到“上下俱富”的目的。“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园、池泽, 公家有鄣假之名, 而利归权家。”(《盐铁论·园池》)“公卿积亿万, 大夫积千金, 士积百金, 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 流离于路。”(《盐铁论·地广》)如此情形, “其乱必矣”(《盐铁论·除狭》)。因此, 贤良文学坚决主张废除官营经济, 允许民间自由经营。“与百姓争荐草, 与商贾争市利, 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盐铁论·地广》)“公卿诚能自强自忍, 食贤良、文学之至言, 去权诡, 罢利官, 一归之于民, 亲以周公之道, 则天下治而颂声作。”(《盐铁论·能言》)贤良文学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 虽然带有民本主义色彩, 但其宗旨仍在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先秦时代已存在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 至盐铁会议, 这两种观点才开始出现正面的交锋。

与贤良文学一样, 魁奈强调自由放任是增加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 一切垄断和政府管制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任何有权力的官吏的介入, 都是不适当的, 如果无智, 甚至更进一步有不良的动机, 那就更加危险。……在一般福利的借口之下, 为了求得特殊利益, 而颠倒了自然秩序。”<sup>[2] 325</sup> “如果有人想把由于不可克服的原因所形成的习惯, 用法律加以限制, 则这种法律不过是对于农业发展附加上新的障碍。”<sup>[2] 18</sup> 魁奈批驳了妨害工商业和限制谷物贸易的国家政策, “在商业和农业的垄断中, 常常会遇到过多的拥护者。如……果子酒的买卖, 谷物的自由交易, ……国家的各个制造业, 在取得垄断的特权中相互破坏。”<sup>[2] 325</sup> 垄断“伤害国民的一般收入”<sup>[2] 335</sup>, “为了增加国富, 绝对需要最活泼的竞争。”在他看来, 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是复兴法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必须维持商业的完全自由。因为最完全、最确实, 对于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 在于保持竞争的完全自由。”<sup>[2] 338</sup> “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够使国家欣欣向荣。”<sup>[2] 166</sup> 魁奈十分深刻地认识到自由竞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反对侵犯个人利益的国家干预, 满足了力求摆脱重商主义束缚的时代需要, 直接催化了古典经济学的诞生。

### 四、提倡农业单一税

在财政政策方面, 为实现“民富”、“百姓足”(《盐铁论·执务》), 贤良文学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贍”(《盐铁论·

未通篇》),“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盐铁论·禁耕》)在征课对象上,贤良文学提出赋税只限于农产品及农家副业所生产的布帛,并坚持什一之税,反对厚敛。“易其田畴,薄其税敛。”(《盐铁论·授时》)“什一而借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盐铁论·未通篇》)只有“赋敛省而农不失时”(《盐铁论·执务》),才能保证国家赋税的顺利实现,“牧民之道……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盐铁论·未通》)这是儒家传统观念“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在贤良文学重农思想中的体现。

和贤良文学类似,魁奈同样认为构成国家收入的租税,只应向生产财富的农业征收。“应当把整个征税制度建立在对土地征税的基础上”<sup>[2]185</sup>,“对于土地所有者,对于君主和全体国民来说,把赋税完全对土地收入直接征收,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课税形式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都是对于再生产和赋税本身有害的,都是会在赋税之上加上赋税的。”<sup>[2]333</sup>在魁奈看来,只有耕种土地才能生产纯产品,因而,赋税应该直接从土地的纯产品征收。“最简单,最合理,对于国家最有利,对纳税人负担最轻的课税形式,是比例于纯产品,对继续再生的财富源泉的直接课税。”<sup>[2]340</sup>“为了避免征税费用增加,妨碍商业,和不至于使每年有一部分财富被破坏,租税就不应对人们的工资和商品征税。同时,也不应对租地农场主的财富征收……不这样做,租税就变成了掠夺,很快地使国家趋于衰落破灭。”<sup>[2]333</sup>“国家所需的赋税总额不可能是别的,只不过是它从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年产品中分得的一个部分。”<sup>[2]411</sup>可见,租税只应向占有“纯产品”的地主阶级征收,“不论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应纳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纳税。”<sup>[2]184</sup>为鼓励农业生产,魁奈主张轻税,并提出十分之一税是最公平合理的税率。他说:“租税不应该过重到破坏的程度,应当和国民收入的数额保持均衡,必须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sup>[2]333</sup>“合理的租税,就是没有掠夺化的不良课税的租税,……每亚尔邦征收十分之一税。”<sup>[2]342</sup>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贤良文学和魁奈的重农思想都是社会激剧变革的产物,是对重商主义政策的直接否定。贤良文学的重农思想早于法国重农主义大约两千年,由于时代背景、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立场的差异,二者的本质内容和历史作用迥然不同。

在发展农业的具体方式上,魁奈极力主张“扩展大农法,排除小农法”<sup>[2]351</sup>,即用资本主义大农业

代替封建小农经营。“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集中在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和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则多得多。”<sup>[2]333</sup>“农业的利益多半决定了土地要集中于大农场,富裕的农场主能将其经营到最佳状态。”<sup>[2]158</sup>魁奈认为运用资本达到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大农业,与分散的封建小农业相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在他的理想中,“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sup>[6]399</sup>为保护租地农场主利益,魁奈提出一切赋税都要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对于租地农场主的预付资本应该免税。“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私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的办法,也是李嘉图学派的充分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结论。”<sup>[4]26</sup>魁奈倡导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其实质仍是为农业资本的发展扫平道路,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追求自由竞争与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早期表现,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前进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那些目光比较远大的重农主义体系代表者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了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了。”<sup>[4]24</sup>与此不同,贤良文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盐铁论·园池》)贤良文学提出的发展农业的方案是分土井田,即实行井田制度。“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盐铁论·园池》)“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盐铁论·力耕》)小农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商品货币化程度较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贤良文学向往“抱布贸丝”的物物交换,不赞成货币流通。“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盐铁论·错币》)为丰富国内物品供应,防止货财外流,贤良文学坚决反对对外贸易。“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玕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搨而中万钟之粟也。……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盐铁

论·未通》)他们认为本国产品已“足用”,“不待蛮陌之地,远方之物。”(《盐铁论·力耕》)因而主张“各安其居,乐其谷,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由之玉不至。”(《盐铁论·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结构,人们对农业的认识水平十分有限,只是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层面,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大农业”观念。贤良文学的井田思想正是构建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并力图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与和谐,至于他们反对官营工商业的思想,其实是统治阶级内部豪族地主集团与皇权争夺商人资本的斗争。商人资本退出朝廷,与商人资本是否被打击毫无关联,它只意味着商人资本不再为最高地主服务,但仍然同豪族地主携手,小工商业者的痛苦只是充当了豪族地主集团的炮弹。“商人资本是这一时期皇权与豪族大地主争取的对象,被谁争取到手、为谁服务,对它自己都有利可图。不像小工商业者或农民,无论在当时哪一种观点和政策支配下,总是讨不了便宜的,只是被掠夺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罢了。”<sup>[7][116]</sup>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传统中国,官营经济是商品的主要经营形式,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专制政权的掌控之下,官营经济培育了封建社会的商品经营秩序和政治伦理规则。西汉之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模式由此确定并巩固下来。

综上所述,贤良文学与魁奈的重农抑商论,在基本的思想要点上十分相近。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重农”的目的都在于挽救病态的封建社会。魁奈代表法国大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他从农业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把对财富的认识由

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最早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因此,魁奈的重农思想虽然具有封建主义外观,但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sup>[6][39]</sup>贤良文学代表的则是封建社会初期豪族地主阶级利益,他们的重农思想是小农经济与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必然产物,其外观和实质反映的都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重农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引导古代中国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重农主义政策的推行,反过来又维持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遏制了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成长。因此,如果说魁奈的重农理论是在主观上维护封建统治,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拓道路,那么,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重农思想其主观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在客观上却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2] 魁奈经济著作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 朱彤书.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Xianliang Literature and Quesnay's Thought of On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WEI Yu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Xianliang Literature and Quesnay ar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s that advocated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Their viewpoints on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hav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es not only indicate the similar or sam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ir nations were confronting, but also reveal the specific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ime spirits that can be pregnant with their great minds.

**Keywords** Xianliang Literature; Quesnay;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restraining commerce; economic thought